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再研究^{*}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郑大华

提要:1938年9月至12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六中全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起了“全党干部学习运动”。正是在这场学习运动中,“学术中国化”被正式提了出来。“学术中国化”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学术影响的自然结果。“学术中国化”提出后,立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重庆等地学术界的响应,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就“学术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这些阐述又进一步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兴起。“学术中国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推动着中国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向前发展,而且也对新中国的学术产生过重大影响。

关键词: 抗战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术中国化

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06)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5.04.001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界在重庆、延安等地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必然要求,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学术影响的自然结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推动着中国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向前发展,而且也对新中国的学术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涉及到“学术中国化”运动时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把“学术中国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等于研究了“学术中国化”。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学术中国化”及其运动缺乏深入而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目前发表的有关文章不到十篇,而且还以人物研究为主;二是扩大“学术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凡是强调中国本位、认同中国传统的都纳入到“学术中国化”及其运动之中,如有的研

^{*}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批准号:13@zH018)和201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究者就把冯友兰等人的现代新儒学、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儒学化、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也算成“学术中国化”及其成果。实际上,这两种倾向都值得商榷。虽然“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但“学术中国化”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者属于学术范畴,后者属于政治范畴,二者有着不同的内容、任务和目标;“学术中国化”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中国本位”,它以“马克思主义化”为“核心”或“本质”,与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有着质的不同。此外,之前的研究多只强调“学术中国化”的积极意义,而很少提及它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学术中国化”运动中产生的不少学术成果过度强调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取向,曾影响了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运动进行再研究,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学术中国化”的提出

1938年9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列斯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不仅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也得到了包括生活在国统区内的广大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久,张申府即在《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上发表《论中国化》一文,高度肯定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段论述,认为:“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由这一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②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还向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发出了“学习”的号召:“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③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发起了“全党干部学习运动”。这场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④也正是在这场学习运动中,“学术中国化”被正式提了出来。“学术中国化”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学术影响的自然结果。

①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534页。

② 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10日。

④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为什么说“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的创新问题，即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由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兼）兼秘书长的杨松在他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马列主义者的文化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坚持自己对于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应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应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去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建立以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为内容和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为形式的中华民族文化，并且在中国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诗歌和自然科学中，获得、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位”^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有“学术中国化”的内容。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也就必然会提出“学术中国化”的问题。换言之，“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理路，“马克思主义化”是“学术中国化”的“核心”或“本质”。既然“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化”是“学术中国化”的“核心”或“本质”，那么，那种把冯友兰等人的现代新儒学、把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儒学化、把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也算成“学术中国化”及其成果的观点便是十分错误的了。当然，我们说“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化”是“学术中国化”的“核心”或“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中国化”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学术中国化”属于学术领域，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政治领域，二者有着不同的内容、任务和目标。

为什么说“学术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学术影响的自然结果呢？我们先来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概而言之，在“学术中国化”正式提出之前，近代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过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清末时期国粹派的“国粹主义”、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西化”或“全盘西化”、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七·七”前后的“新启蒙运动”和“学术通俗化运动”这样几个阶段，总的来看，人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到了“七·七”前后，“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一种异文化（或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他们还认识到，一种新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处在今日的世界，一种一国的运动，似乎也只有如此，才有力量……今日的启蒙运动不应该只是‘启蒙’而已，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科学评估，有个真的深的认识。这样子，也才可以做到……文化的综合”^②。应该说，“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的上述认识，相对于以前的“中体西用”、“国粹主义”、“西化”或“全盘西化”、“中国本位”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来说，是一质的飞跃或巨大进步。与此同时，在学俗通俗化运动中，一批思想敏锐的哲学工作者开始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继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又出版了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两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将哲学的深奥理论与大众生活和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做到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此后，陈唯实出版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胡绳出版了《新哲学的人生观》，并以书信的形式写成《漫谈哲学》。特别是1937年李达在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的《社

^① 杨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

^②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2日《北平新报》。

会学大纲》，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教科书体系，毛泽东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①学术通俗化、大众化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中国化”，但它无疑是“学术中国化”的初步。实际上，“学术中国化”运动就是上接“新启蒙运动”和“学术通俗化运动”而来，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嵇文甫在他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学术中国化运动，是伴随着学术通俗化运动，或大众化运动而生长出来的。当‘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一个新的‘五四’运动——爆发于北平的时候，上海方面早已有救国会诸先生在那里活跃。沈志远、钱俊瑞、艾思奇……各位先生们，乘着这个运动，努力展开学术通俗化运动，把世界上最前进的学术思想，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运动极为广泛而深入，在中国青年中发生极大的影响……随着‘七·七’抗战的兴起，这个运动更加速的进展，直到最近，‘中国化’这个口号乃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很有力地涌现出来。我相信，从今以后，这个口号将响彻云霄，随着抗战建国运动而展开一个学术运动的新时代。”^②也正是因为“学术中国化”运动上接“新启蒙运动”和“学术通俗化运动”而来，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因此，“学术中国化”的倡导者们，一方面强调“学术中国化”运动与‘七·七’前后的“新启蒙运动”和“学术通俗化运动”之间的联系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学术中国化运动”与之前的“中体西用”、“国粹主义”、“西化”或“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的区别与不同。柳湜在《论中国化》中就一再强调：“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与“国粹主义”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学术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决不与今日复古的倾向有丝毫的姻缘，同时它也决不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学术中国化”是反对这些国粹主义、文化的排外主义与文化偏颇论、中西文化对立论的，“学术中国化”的提倡者也决不是盲目的西化论者和奴化论者。^③

而就“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学术的影响来看。“九·一八”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固有学术的研究对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侵略、实现民族复兴有它的重要意义。借用熊十力的话说，“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凡吾固有之学术思想、礼俗、信条，苟行之而无蔽者，必不可弃”。这也是“九·一八”后，学术界在反思此前“整理国故”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的重要原因。到了“七·七”之后，随着“抗战建国”的提出，人们又提出了“学术建国”的问题，认为“学术”在“抗战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研究，是“抗战建国”的一项重要工作。^④正是在此背景下，“学术中国化”被提了出来。因此，它的提出是“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学术影响的自然结果。柳湜在《论中国化》一文就明确指出，表面看来，“学术中国化”的提出，好像是对我们过去不能正确对待外来学术思想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的一种纠正，一种号召，是对当前“洋八股”和“教条主义”的批判。如果仅从这方面来理解“学术中国化”的提出不是很适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应从“当前的政治实践所反映于文化的要求、反映于新的学术运动上”来“找它的根据”。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中国军民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进入到抗战的第二阶段，这奠定了抗战建国的基础，树立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提高了国民对于抗战建国的热情，同时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文化在今日不仅要承担起提高民族意识、动员全国人民投身抗战的任务，同时还要承担起提高中国新的文化、配合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就前者而

①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页。

②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③ 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④ 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第210—211页。

言,表现为一般文化水准的提高、文化的普遍化和大众化;从后者来看,表现为提高新文化的质、开展新的学术运动。抗战一年多来,大众文化运动有了空前的开展,对新文化质的认识也在一天天的深化和提高,这说明“今日的抗战需要有全面全民族的动员在各社会层精诚团结之下进行,同时亦要求有一个新的、更高度的文化运动配合这一政治的要求,而领导这一民族的神圣战争与建国事业”。因此,“‘中国化’这一口号,在新文化发展的今日……它绝不仅限于纠正过去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不溶化,纠正我们学习上、学术上许多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给我们一种警惕,而是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①。潘菽同样认为,学术之所以要“中国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学术适合于抗战建国的需要。因为中国要抗战建国,从一个旧国家变成一个新国家,当然有种种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有待于近代学术的帮助解决”。但外国的学术是为了解决外国社会的种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未必适合于中国的需要,要使它们适合于中国的需要,就必须实现学术的中国化。^②

二、“学术中国化”的内涵

1939年4月1日,重庆的《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率先开辟“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柳湜的《论中国化》和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等论文,同时还发表了笔名为“逖”的《谈“中国化”》的笔谈文章。1939年4月15日,《理论与现实》杂志在重庆创刊,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侯外庐、马哲民、曹靖华、潘梓年、钱俊瑞担任杂志创刊时的编委,沈志远担任主编。该刊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宗旨,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和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两篇讨论“学术中国化”的重要论文,接着,在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和第2卷第2期(1940年4月15日)上又有嵇文甫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和吕振羽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重要论文发表。此外,《新建设》等刊物也先后刊出了许崇清的《“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等讨论“学术中国化”的论文或文章。概括上述这些讨论“学术中国化”文章的观点,“学术中国化”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问题,整理中国学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潘梓年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中指出:学术中国化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在抗战中所起的各种变化,怎样使这些变化向进步的方向走去,更快的发展前去,这样来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去研究中国自然环境中的各种资源动力,运用这些资源动力来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化的各种国防工业及其他各种工具,改进中国的农业,这样来建立起中国的自然科学”。^③柳湜在谈到“学术中国化的具体内容”时也再三强调:“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一切的问题。反对过去一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历史的运动,抽象的空洞的调头,或故意滥用科学方法去歪曲中国历史以达到自己不纯正的政治的目的。”^④就此而言,所谓“学术中国化”,亦就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这是学术中国化的本质。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学术中国化的本质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要在学术思想领域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⑤

①④ 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② 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③ 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⑤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

第二、充分吸收外来学术和文化,但这种吸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通过消化,把外来的学术和文化变为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味道、中国的特色。潘梓年指出:“学术,是决不会有什么国界的。如果在学术上把中国用一道万里长城和外国分疆划界起来,企图‘互不侵犯’,那就是自封自划,夜郎自大,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学术发荣滋长,而且还要‘瘦死狱中’。但是,学术虽无国界,但却不能没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色彩与风光。学术中国化,绝不就等于保存国粹,而是要使我们的学术带着中国的味道、中国的光彩而发展生长起来,要使我们的学术成为中国的血液与肌肉,不成为单单用以章身的华服。”^①柳湜强调,学术中国化“不排斥外来文化,并承认世界文化的交流乃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们要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一切进步的文化,溶化它,通过民族的特点、历史的条件和中国抗战建国过程中的一切具体问题,把它变为自己的灵魂,‘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②。嵇文甫写道:“学术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要把外来文化变为自己的文化,而非关起门来,像国粹派那样,以为什么都是中国的好,一切都用中国固有的,在文化上实行排外主义。实际上,“学术中国化”并不反对外来文化,它所反对的,“是不顾自己的需要,不适应自己的消化能力,不和自己固有的东西有机地联系起来,而只把外来文化机械地、生吞活剥地往里面搬运”^③。就此而言,所谓“学术中国化”,亦就是外来学术或文化的中国化,借用潘梓年的话说:是“把世界已经有了的科学,化为中国所有的科学”^④。

第三、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文化遗产,但不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全盘继承和发扬,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和发扬的只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部分。柳湜指出:今日中国文化是要吸收世界文化一切优良的成果来丰富自己、武装自己,创造中国新文化。根据吸收世界文化这一点,我们提出“学术中国化”的口号来,有它的积极意义。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是“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鲁迅语)的那种盲目西化论、奴化论者,我们在吸收世界文化一切优良的成果来丰富自己、武装自己的同时,也并未忘记“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好的民族的传统,批判的接受民族优良的传统,但不是无所分别的一些陈腐残渣兼留并蓄”^⑤。嵇文甫指出,所谓“学术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离开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无从讲“学术中国化”。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非常复杂,简单地讲“批判地接受”或“取优汰劣”,这是不够的,因为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实在难以判断,即便你以是否符合“现代的生活”为标准,也还是无从辨认。“我们尽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好,同时,又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好。这些地方,参互错综,变动不居,不能机械地看。”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呢?对此,他以“传统的旧文化”为例,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传统的旧文化中,有许多东西,根本就带着一般性或共同性,根本就不是某一个特殊时代所独有,和现代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像许多立身处世的格言,有些固然已经失其时效,但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有其价值,如《论语》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不知老之将至”这两句,就非常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这些“当然可算作我们民族优良传之一,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第二,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虽然它原来的具体形态与现代生活不能相容,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它的具体形态早已被历史淘汰,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是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而这些精神或远景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或暗示,

①④ 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② 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③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⑤ 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如《孟子》一书中所讲的“王道”，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也可以接受”。第三，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看着虽然是乌烟瘴气的，但其中却包含着某些真理，或近代思想的某些因素，如宋明理学中的“合理内核”，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那样，“从神秘的外衣中，剥取其合理的核心”。第四，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从现在眼光来看，虽然没有什么道理，甚至非常荒谬，然而在当时却有它的进步意义，如晚明时代“左派”王学家的学说，“对于这些，我们不妨舍其本身，而单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阐扬其进步性”^①。潘菽指出，学术中国化本身就包含着如何对待或处置中国旧学术的问题。在对待或处置中国旧学术问题上有三种办法：一是继续保留并应用中国旧学术，而以新学术为补充或辅助。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只管引进和吸收新学术，而对旧学术不管不问，让它自生自灭。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对待或处置旧学术的办法。三是把旧学术变成新学术。而这第三种办法“可以说是‘顺乎天理而合于人情’的，因此也就是最合理最妥当的办法”。因为“旧的学术里面也有许多可宝贵的成分，我们必须继承下来，我们假如忽视了它，那便是等于不顾现实，不顾历史，而要凭空有所作为，假如这样，我们也就无须学术中国化”。如何把旧学术变成新学术呢？潘菽认为，要把旧学术变成新学术，一方面把旧学术中的渣滓去掉，另一方面把旧学术中的精华提出来，以容纳于新学术之中。^②就此而言，所谓“学术中国化”，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第四、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侯外庐认为，“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知难行易’的传统的继承，使世界认识与中国认识，在世界前进运动实践中和中国历史向上运动实践中统一起来”。^③潘梓年指出，学术中国化“就是把目前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使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切问题”。^④潘菽强调：“所谓学术中国化的意义就是要把一切学术加以吸收，加以消化，加以提炼，加以改进，因以帮助解决新中国的建设中所有的种种问题。”^⑤就此而言，学术中国化运动不仅是理论活动，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学术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当然，上述这四个方面的内涵是相互联系的。柳湜在《论中国化》一文中就强调指出：学术“‘中国化’是建设新中国文化的一个口号，是配合着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历史的任务而提出的，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学术的，同时是战斗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今日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为它的任务”^⑥。

以上这些论文或文章的发表，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兴起。郭沫若在《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中说到：“‘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提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门的热烈响应，创作者热烈地讨论复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方戏，作实验公演；音乐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中国具体问题，并提倡出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口号；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在抗战建国上的各种问题。”^⑦在延安、重庆等地广大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学术中国化”在各学术领域都有所推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①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②⑤ 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③ 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④ 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⑥ 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⑦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四年》，青年书店，1941年，第190页。

三、“学术中国化”的评价

“学术中国化”的提出及其运动,推动了中国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向前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1949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①即:第一个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第二个时期是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而推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便是“学术中国化”运动,正是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产生了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一大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这其中又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影响最大。范书是应毛泽东的要求而撰写的,自1940年11月开始在《中国文化》上连载。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篇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那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通史的开篇之作,它的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从形成走向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评论该书说:“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合适的了。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以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②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的上册出版于1941年5月,早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4个月,下册则因工作耽搁,到1948年5月才出版,晚《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5年。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的“自序”中谈到了该书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的“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把中国史看作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过程来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而是根据“学术中国化”的要求,从具体历史事实的陈述中,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观念的渗入。”这三点的“不同”,集中体现了《简明中国通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贡献。

哲学的“中国化”,主要表现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早在1938年4月,亦即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些成绩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等方面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它只是使外国哲学概念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已,并没有实现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因此,我们如果要继续指导哲学推向前进,就“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同年7月,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小册子的

^① 此可参考蒋大椿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2—187页。

^②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期,1949年10月。

前言中对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认为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
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
“学术中国化”运动兴起后,学术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就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培元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指出,“哲学中国化”主要讲的是“新哲学”的中国化,“新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本质”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①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提出,哲学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②。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处理好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哲学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主要代表是毛泽东。他不仅一贯倡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批判地整理和继承中国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而且自身就是实践这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正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成熟为主要标志的。“具体说来,在辩证唯物论方面,是1937年7、8月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思想路线;在历史唯物论方面,则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③

除了被视为其他学科“中国化”之基础和前提的史学和哲学外,其他学科的“中国化”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在经济学方面,王亚南认为经济学家要“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要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造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他本人在40年代中期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来考察旧中国的经济,该书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

“学术中国化”的提出及其运动,不仅推动着中国学术的发展,而且也对新中国的学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一大批活跃于“学术中国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以及华岗、吴泽、杜国庠、嵇文甫、艾思奇、胡绳、周扬、潘梓年、钱俊瑞等,新中国成立后是新中国学术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和学术研究的带头人,比如,郭沫若担任了建国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范文澜担任了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担任了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翦伯赞担任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并兼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吕振羽担任了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和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华岗、杜国庠、嵇文甫、吴泽等人也都担任了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领导并从事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学术中国化”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为新中国的学术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新中国的学术就是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以历史学为例,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的著作,影响了新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五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运用、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建立起来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体裁、体系,甚至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新中国的学者们奉为“经典”而被遵守、继承和发扬。这正如当今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中国历史学创建时期历史研究的

① 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② 艾思奇:《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0页。

③ 楼宇烈主编:《中外哲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新进路,无论是通过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历史分期的讨论探求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特点及其转化的路径,或是通过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特点的讨论探求中国封建制社会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及其转化路径,还是通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探求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难产性等,都是围绕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及其实现形式这一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主题展开的。这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①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学术中国化”及其成果的同时,也要对“学术中国化”及其成果的负面影响有清醒的认识。1951年,范文澜在重修《中国通史简编》时,对抗战时期的通史写作有过回顾。他说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缺点和错误很多,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书里有些地方的叙述有非历史主义的缺点;二是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应该说,这两方面“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借古说今”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有些还相当严重。因此,当时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普遍评价不高。如齐思和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评价:“此书既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若以哲学眼光观之,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吾人阅毕郭氏之书,颇难得新见,而郭氏之所矜为新见者,如以孔子为乱党,亦多非哲学问题。且多有已经前人驳辨,而郭氏仍据以为事实者。故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氏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也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②又如1945年顾颉刚在评价抗战以来出版的中国通史性著作时写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著作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成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③顾颉刚在书中根本就没提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马克思主义的通史著作。这并非是他没有看到这些著作,而是他认为这些著作没有“达到”或“较近”他所认为的“理想的地步”,不值一提。不可否认,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普遍评价不高,其中有非学术的原因,如政治立场的不同、历史观的不同,等等,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范文澜所讲的两方面“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借古说今”的普遍存在,就不能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之所以会普遍存在范文澜所讲的两方面“缺点和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著作的作者没能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过度强调了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要为当前的抗战建国服务,他们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不是为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研究历史,而是为了革命的需要研究历史。因此,他们在著作中,往往“借古说今”、“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抨击现实政治、现实人物。这种“为了应付眼前需要所写出来的历史,虽然表面上是在分析过去,而实质上则处处是在影射现在。这样一来,历史就变成了一个任人予取予求的事实仓库,它本身已没有什么客观演变的过程而言了”^④。范文澜所讲的两方面“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借古说今”的影射史学,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产生过长期的非常不好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它的一定市场。对此,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田明孝

① 卢钟锋:《新中国历史学创建时期历史研究的新进路》,《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齐思和:《评郭沫若十批判书》,《燕京学报》1946年第39期。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转引见《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④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3页。